

• 中医英译 •

藏医学典籍《四部医典》英译本 (1835—2022)评析

成悦¹ 甄艳¹ 扎西拉毛^{1, 2}

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1]。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将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和“积极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列入未来十五年我国中医药发展的重点任务^[2]。在国家助力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时代背景下,中医药翻译尤其是典籍外译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作为中医药翻译的重要分支,我国少数民族医学翻译研究却始终较为薄弱。一方面由于中医药翻译多以汉族医学为研究重心,少数民族医学所得笔墨较为疏落,鲜处于鲜有人问津的边缘化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医学翻译涉及医学、文献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等多个领域,天然被赋予学科交叉和文理结合的显著特点,有着极强的综合性与复杂性,现有的研究力量还无法与其学科难度相适配。

事实上，无论是在文化底蕴的纵深积淀上，还是在地域传播的流布广度上，少数民族医学都已具有相当深厚的历史基础。其中，藏医学《四部医典》堪称代表性著作之一。《四部医典》藏文全称བད་པའི་རྩིང་པོ་ཡན་ལག་བརྒྱུད་པ་གསལ་བ་མན་ངག་གི་རྒྱུད་ཅེས་བྱ་བ་བཞུགས་སོ།，简称བྱུང་བཞི།（音译为“据悉”），成书于8—12世纪，是由著名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总结藏医学理论和实践经验，吸收中医学、古印度医学和大食医学等知识编著而成。全书分为《根本部》《论说部》《秘诀部》《后续部》四个部分，共156章，详尽论述了藏医学有关人体生理病理、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和药物方剂等方面内容，被视为与《黄帝内经》《伤寒论》相媲美的医学著作。

《四部医典》翻译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300多年前。据考证,在17世纪《四部医典》就被译成托忒蒙古文^[3]。自19世纪30年代现代国际藏学研究兴起之后,又被译为英、俄、法、德、日和中文等多种语言文字传播至世界各地,已形成民译、外译与汉译共存的多方位译介格局,仅外译就有逾百年的历史。然而,我国对《四部医典》外译进行的历史却并不长。1985年,蔡景峰在“论民族医学史的研究”一文中介绍了国外对《四部医典》的翻译和研究概况^[4],后又在《中国藏医学》中予以丰富和深入^[5],为我国《四部医典》外译研究的先驱。但迄今为止,在《四部医典》的翻译历史、译本评析和译者研究等多个更深层面,尚未出现系统的梳理成果,仍是一块近乎空白的学术地带。

由于国内外藏医学的发展和藏医药价值的日益凸显,《四部医典》早已经成为世界藏学界和医学界重要的研究热点。2023年5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6次执行局会议上,由我国国家档案局组织申报的《四部医典》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6],成为继《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之后入选该名录的又一中国传统医学著作,表明包括藏医药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医药文化进一步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四部医典》在海内外赢得盛誉，不仅取决于其本身重要的历史文化地位与医学价值，也与翻译密切相关。然而典籍翻译殊非易事，因《四部医典》成书久远，通篇以韵体古藏文写成，文辞深奥难懂，以何方式将藏医学知识与文化内涵呈现给读者，有赖于译者发挥主体性，以现代语言对《四部医典》进行诠释。译者主体性，亦称“翻译主体性”，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即翻译主体能动地操纵原本、转换原本，使其本质力量在翻译行为中外化的特性^[7]。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8]。译本价值与译者主体性，影响着《四部医典》在海内外的传播效果、构成典籍翻译史的重要一环。

有鉴于此,本文收集和整理了1835—2022年间公开出版的11个《四部医典》英译本及其相关资料。根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 (No. 22VJXG039);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No. ZZ130513)。

作者单位: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 100700);
2.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文献研究所(拉萨 850000)

通讯作者: 甄 艳, Tel: 010-64089116, E-mail: 158136474@qq.com

DOI: 10.7661/j.cjim.20230911.157

据译本出版特征,划分为学术论文、选译本和单行本三种类型。在此分类基础上,以时有序,从产生时间、出版特征和翻译文本三个方面,介绍译本基本情况。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分析译者身份背景、翻译目的与藏医学名词翻译方法,对文本价值与历史意义进行述评,由此梳理《四部医典》百年英译历程。同时,期以此管窥之见,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我国少数民族医学典籍翻译研究的重视,促进中医药翻译事业的全面发展以及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1 雪域明珠的跨界旅行:《四部医典》的英语译介随着 17 世纪以来入藏探险活动在西方世界的萌发,一批又一批进藏传教士将新鲜又独特的西藏文化介绍到欧洲,吸引了各国学者的注意。1823 年,一位名为亚历山大·乔玛·德克勒希(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 1784—1842)的匈牙利人来到拉达克(Ladakh)地区研习藏文,坚信在亚洲东部能找到匈牙利民族的根源,并不倦地为此奋斗着^[9]。1834 年,他编著的《藏英字典》和《藏语语法》终于出版,标志着现代藏学研究的形成,从此西藏学(Tibetology)真正地成为了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拉开了《四部医典》英译历史的序幕。

《四部医典》英译肇始于 1835 年乔玛发表的一篇文章,时隔了 130 多年,才诞生 1973 年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英文节译本。此后 50 年时间里,《四部医典》英译速度明显加快,几乎每 10 年都有新译本产生。目前公开出版的《四部医典》英译文本至少有 11 个,均为节译本。翻译内容涵盖章节片段、多章节、单部或多部。出版方式可分为三种:一是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二是作为章节内容收于专著或学位论文中;三是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本文即在此分类基础上,对《四部医典》英译文本作一梳理和分析。

1.1 学术论文

1.1.1 乔玛译文 1835 年,乔玛根据西藏喇嘛的手稿,撰写了一篇题为“对一部西藏医学著作的分析”(Analysis of a Tibetan Medical Work)的文章,并刊于《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10],这是最早以英文形式译述《四部医典》的资料,大抵是受他“寻根”热情的驱动。在文本中,乔玛对《四部医典》作了逐部逐章的简要介绍,伴随着对章节片断不连贯的翻译,但未对著作作出评价,也仅有少量的注释。由于当时缺乏西藏语言、文化和医药等方面的工具书,乔玛翻译时很大程度只能依靠个人的理解和工作基础。对于名词术语,乔玛多采用意译的译法,如将三因学说中的“隆”(རྩལ་པ་)、“赤巴”(མཁའ་པ་)和“培根”(བད་ཀྲི)分别译为“wind”“bile”和“phlegm”。少量词汇保留了藏文原文,或以原文结合注释的手段处

理。但也存在一些误译、错译的情况,比如将药材放在水中煎煮后发酵而成的“药酒”(མཁའ་པ་)译为“medicinal wine”,以矿物药为主的“珍宝药”(རྩལ་པ་མཁའ་པ་)译成“precious stones”。

尽管乔玛译文存在一些问题,但他的工作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映射了藏医学名词术语英译的早期探索,有不少的译法被沿用至今,并成为后世译者重要的研究基础。同时也比较通俗易懂,便于西方读者快速了解《四部医典》内容概况,对《四部医典》在西方的译介立有开启之功,足可称作译史上的丰碑。

1.1.2 埃默瑞克译文 1975 年,澳大利亚裔英籍学者罗纳德·埃里克·埃默瑞克(Ronald Eric Emmerick, 1937—2001)在《泰东》(Asia Major)杂志上发表论文“《四部医典》的一章”(The Chapter from the Rgyud-bzi),翻译了《根本部》的第 3 章“病理生理”。全文共 22 页,分为原文、评注和译文三部分。他表示:“本章的发表,也是我为《四部医典》全文(翻译)提供的理想范例”^[11],表明译者旨在追求翻译的学术性。

自 1971 年起,埃默瑞克就一直在德国汉堡大学教授伊朗语言学,也是欧洲阿育吠陀学会副主席和该学会期刊的联合编辑^[12]。他毕生致力于阆语研究,对梵语和藏语亦有深入了解。他翻译时主要参考了法国巴黎亚洲学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Société asiatique)的两个木刻本,法国研究院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 France)所藏《蓝琉璃》(Vaidūrya śhōn-po)木刻本,《四部医典》达兰萨拉印刷本以及伊丽莎白·芬克(Elisabeth Finckh)所提供的印刷本,并结合阿育吠陀文献作了详细校对。

该译文使用了大量方括号“[]”用于增译,通篇句型也比较复杂,并列句与复合句居多,彰显了埃默瑞克深厚的语言功底和严谨翻译态度,这显然与其自身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和母语用学习惯紧密相关。埃默瑞克的翻译以意译为主,许多译法与乔玛一致,如对“隆”“赤巴”和“培根”的英译。但他似乎对藏医学名词概念不太了解,存在一些理解偏差,如将“精华”(རྩལ་པ་)译成“chyle”(乳糜),“虫”(མྱ་པ་)译为“worms”(蠕虫),明显不太妥当。

总体来看,埃默瑞克的译文只涉及一章,篇幅较小,也有一些错译之处,研究价值有限。另外,从名词翻译可以看出他对藏医学理论了解不深,是从语言学家,而非医学家角度来翻译的。

1.1.3 施泰纳译文 1987—1989 年,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院的罗布·普拉萨德·施泰纳(Rob Prasaad Steiner)博士在《美洲中国医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上先后发表了

4 篇围绕《四部医典》论述的连载性论文,以全英文形式节译了《后续部》第 1 章“脉诊”^[13-16]。该译文是藏医叶西东登(Yeshe Donden)在 1979 年诵读,经编辑转录员记录,再由精通藏、英两种语言的藏族喇嘛洛桑拉盖(Lobsang Rapgey)翻译,最后修改整理成论文发表。有别于传统翻译形式,该译文是在藏族同胞和西方学者多人共同协作下,经多次转译和反复编辑才形成的文本。

该译文倾向于归化翻译,对《四部医典》“脉诊”内容作了较多删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文面貌。比如把原著特有的仙人问答内容完全删去,对于“寸”“甘”“恰”等藏医学文化负载词也一概省去不译,改以现代解剖学理论作了一般描述,更像是一篇藏医学脉诊知识的科普文章。但该译文仍有其可取之处,如果能够进一步优化翻译形式,更好地利用藏族同胞以藏文为母语的理解优势和西方学者以英文为母语的表达优势,将二者结合起来,确实能够为翻译《四部医典》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1.2 章节选译本

1.2.1 甲白衮桑译文 1973 年,海外藏族学者热琼仁颇且·甲白衮桑(Rechung Rinpoche Jampal Kunzang, ?—2007)编著的《西藏医学》(*Tibetan Medicine: Illustrated in Original Texts*)由英国伦敦威尔康医史研究所(Wellcome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联合出版。1976 年,加州大学出版社予以重印再版。1986 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蔡景峰将该书翻译为汉文,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发行。

以加州大学出版社重印再版的版本为例,全书共 340 页,除作者序言外,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依次为导言,西藏医学史,西藏医学,欧洲关于藏医学著作的文献目录和插图;第二部分包括医圣老宇妥·元丹贡布的传记,术语解释与索引。该书节译了《论说部》,以及《后续部》中脉诊和尿诊两章,译文篇幅约占全书五分之一。该书一经出版,便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美国医学史家伊扎尔·威斯(Ilza Veith)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应将这本书视为迄今以西方语言写成的,最有价值的藏医著作之一”^[17]。蔡景峰认为“它是迄今所能见到的除藏文以外用其他文字写成的一部最详细、内容最丰富的藏医学史著作”,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18]。

甲白衮桑出生于西藏拉萨,于当地学习传统藏医学,后来在锡金甘托克的南杰藏学研究所(Namgyal Institute of Tibetology)从事藏学研究,并担任所长。他在序言中表示:“为了保存藏文化,我十分渴望能翻译一些藏医学书籍,以及老宇妥·元丹贡布传记”^[19]。之后,甲白衮

桑就这一想法与英国威尔康研究所所长波因特博士(Dr. F.N.L. Poynter)交流,并获得支持。在该所资助下,开始了《西藏医学》编译工作。他在翻译和创作过程中,得到了威尔康研究所图书馆员玛丽安·温德(Marianne Winder)和其他学者给予的语言和资料上的帮助,以及藏医学、佛教和植物学等方面的指导。因此,该书的撰成不仅来自于作者个人的努力,更是众人合力的成果。

但从译文内容来看,该书并未按照《四部医典》原文顺序将内容完整译出,译文呈跳跃性和不连贯的特点。名词翻译也毫无章法可循,存在很多前后不统一的地方,仅“精液”(ཇལ་ཤིང་)一词就有“Saliva”“semen”和“sperm”等多种译法。有些译句也容易引起歧义,比如将“汗液予皮肤柔润,使毛发坚实”(རྩལ་ཤིང་ལགས་པ་མཉམ་ནི་དང་ལྷན་ཆུ་བཟུང་།)^[20],译为“The semen enriches colour, complexion and gives lustre to the body.”(精液使人的面容红润,富有光泽)^[19],未准确表达出《四部医典》原文原意。

尽管如此,作为目前已知第一部用英文写成,并公开出版的藏医学专著,也是继乔玛片段译文之后,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四部医典》英文节译本,对于推动藏医学以及《四部医典》走向世界仍发挥了积极作用。

1.2.2 芬克译文 德国医生兼藏学家伊丽莎白·芬克(Elisabeth Finckh, 1912—1993)翻译了《四部医典》部分章节,将译文写入她的《藏医学基础》(*Foundations of Tibetan Medicine*),先后以德、英两种文字出版了这部专著。该书英文版的第一卷于 1978 年在英国伦敦沃特金斯出版社(Watkins Publishing)出版,第二卷于 1985 年由罗宾逊图书(Robinson Books)发行。1988 年,元素图书有限公司(Element Books Ltd)将第二卷重印再版,该版本共 126 页,分为序言、简介与致谢、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附录包括藏文转写、著作标题、参考文献、书目和插图来源^[21]。据闻,芬克原计划将该书分为三卷出版,但在第一、二卷出版的几年后,她便悄然离世,因此第三卷的编写工作也未能继续下去。已刊行的两卷涵盖了藏医学历史、一般基础知识、《四部医典》简介、藏医理论体系、诊断与治疗等方面内容^[22]。1988 年,芬克的又一专著《藏医学研究》(*Studies in Tibetan Medicine*)在美国纽约雪狮出版社(Snow Lion Publications)出版,全书共 77 页,有不少内容节选自《藏医学基础》。书中单设一章专论脉学,选译了《四部医典》脉诊段落,并将藏医与中医的脉学理论进行比较。芬克为内科学专家,对神经学、精神病学和热带病医学亦有所涉猎。她早年就对西藏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于 1962 年和 1967 年两度前往喜马拉雅山脉附近的达兰萨拉拜访当地的藏医,期间与叶西东登相识,并拜他为师,这段经历对芬克及其著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译了《秘诀部》第 85 章“腹部创伤”前两节内容，目的在于比较《四部医典》与《解剖明灯》《毕吉黄函》以及宇妥早期著作有关腹部创伤的内容，以分析《四部医典》与这些著作间的联系^[29]。对于藏医学名词，央嘎多采用意译+音译的方法，音译内容置于圆括号内。如将“心识”（མེས་པོ།）译为“mind (sems)”，“长肋”（རྩེ་རིང་།）译为“the longest rib (rtsib ring)”。并结合增译法，用方括号“[]”增添词句，使译文更加准确顺畅。

1.3 单行本

1.3.1 达什译文 1994—2001 年，在印度国家科学院（Indian National Science Academy, INSA）主持下，任职于印度政府卫生部的印度阿育吠陀专家瓦迪亚·巴格万·达什（Vaidya Bhagwan Dash, 1934—2015）翻译了《根本部》和《论说部》全部章节以及《秘诀部》第 1~11 章。这部译本名为《藏医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Tibetan Medicine*），由印度德里的斯里萨古鲁出版社（Sri Satguru Publications）出版。1994 年刊出了它的首卷，八年时间里共有七卷面世，累计长达 1281 页。达什原计划将《四部医典》的内容全部译出，分为十五卷发行。但第七卷问世后，余卷便杳无音讯，他本人也已于近年逝世。

这部译本集藏文（拉丁转写）、梵文与英文于一体，旁征博引，参考了大量阿育吠陀著作对《四部医典》进行注释，以文献学价值见长。此外，译者在各章节之下增加了相应小标题，用以概括段落大意，便于读者直观地了解内容主旨。因此，这是一本结合了译者个人理解，并将阿育吠陀医学知识融贯其中的《四部医典》译本。丰富的引文与注释为读者理解《四部医典》提供了有益参考，但也容易影响译文连贯性。

达什在翻译《四部医典》时，深度结合了阿育吠陀医学。比如将章节“隆病治法”（རྩེ་གཞན་པོ་ལྟེན་པ།）译为“Treatment of *Rluñ* Diseases (Vātopakramaṇīya)”，仅其小标题之一“Signs and Symptoms of Diseases Caused by *Rluñ* (Vāyu)”就列举了数条阿育吠陀参考文献。这样的篇章布局，是因为达什认为“这部著作（《四部医典》）最初在印度用梵文写成……后来才被翻译成藏文”^[30]，“将《四部医典》译为英文，有助于未来复原其梵文文本”^[31]。关于《四部医典》源自何处，蔡景峰、洪武娉已在《<四部医典>考源》中作了有力考证，即“这部藏医学经典著作是藏族先民的优秀创作”^[32]。因此，可以否定达什把《四部医典》当作印度梵文遗作的观点，他的翻译出发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1.3.2 克拉克译文 1995 年，在新西兰从事藏医临床工作的巴里·克拉克（Barry Clark）编著的《藏医精要密续》（*The Quintessence Tantras of Tibetan Medicine*）在美国纽约雪狮出版社（Snow Lion

Publications）发行。全书共 260 页，分为前言、译者简介、译文、一般注释、藏文名称注释和索引，以全英文形式翻译了《四部医典》前两部，即《根本部》和《论说部》。克拉克认为，《秘诀部》与《后续部》的内容过于广博和晦涩，因此一直未被译为英文^[33]。此外，他在序中对曾给予他帮助的学者和单位致以谢意，并引用了一位藏医的话，“挖掘和揭示藏医学宝库的任务无法单靠个人力量完成，需要多人共同努力”^[33]。诚然，《四部医典》英译事业绝非一人一时之功，背后凝聚了集体智慧与各方心血。

克拉克出生于英国，师从藏医叶西东登（Yeshe Donden）和白玛多杰（Pema Dorje）。他花了近 20 年时间学习传统藏医学，兼备藏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知识。克拉克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如将“日常起居”（ཉན་རེ་བཞིན་སྤྱད་པུ་སྤྱོད་པ།）译为“Routine Behavior”，“身体形成”（ལུས་ཀྱི་ཆགས་པ་ལྟར་བཟུང་བ།）译为“The Way in Which the Body Is Formed”。虽然缺少了原文的韵律和美感，但仍能表达基本意思，容易被译入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整体而言，这部译本用词简单，无太多复杂的语法结构，译文简洁明了，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

1.3.3 印度“门孜康”译文 印度达兰萨拉的“门孜康”（Men-Tsee-Khang）专门设立了一处独立的翻译部门，旨在将《四部医典》全译为英文，由三名藏医承担此项翻译工作。其中，藏医妥梅班觉（Thokmay Paljor）为首席翻译，巴桑旺堆（Passang Wangdu）和索南卓玛（Sonam Dolma）为助理翻译，另由六名医生组成审查委员会，负责修订和审查译文文稿。2008 年，该团队翻译了第一部《根本部》和第二部《论说部》全部章节，译本名为 *The Basic Tantra and The Explanatory Tantra from the Secret Quintessential Instructions on the Eight Branches of the Ambrosia Essence Tantra*，在印度达兰萨拉“门孜康”出版社（Men-Tsee-Khang Publications）出版。全书共 375 页，分为前言、出版说明、序言、正文、附录、参考书目和索引七个部分^[34]。2011 年，刊行第四部《后续部》译本 *The Subsequent Tantra from The Secret Quintessential Instructions on the Eight Branches of the Ambrosia Essence Tantra*，全书共 349 页^[35]。2017 年，发行第三部《秘诀部》译本 *The Oral Instruction Tantra from the Secret Quintessential Instructions on the Eight Branches of the Ambrosia Essence Tantra* 第一册。该册共 451 页，翻译《秘诀部》第 1~27 章^[36]。据闻，该团队已完成《秘诀部》全文英译工作，译文将于近年整理出版。

这部译本的特点主要有 3 个：一是严格按照《四部医典》原书内容顺序，印刷体藏文与英文相互对照，分

句分段进行翻译,便于查找原文与译文,充分考虑不同语言背景读者的阅读习惯;二是注释多以尾注的形式附于章节末尾,减少了译者翻译行为对读者阅读的干扰,译文连贯流畅,可读性强;三是参考了较多藏英语文词典,如《藏英词典》(A Tibetan English Dictionary)、《新英藏词典》(The New 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和《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等,引证权威全面,释义详实可信,学术价值较高。遗憾的是,这部译本存在很多藏文和英文单词拼写错误,《四部医典》开篇第一句译文就出现藏文拉丁转写错误,文本严谨度不足。

对于书名翻译,该译本遵照《四部医典》藏文书名,直译为“The Secret Quintessential Instructions on the Eight Branches of the Ambrosia Essence Tantra”,即“甘露精要八支秘诀续部”。名词翻译方法较为灵活,音译和意译均有所涉及。如把“精液”(ཇལ་པ་)意译为“regenerative fluids”,便于向读者传达名词信息。又将“赤巴”(མཁྲིའི་པ་)音译为“Tri-pa”,把“身体元气”(ལུ་ཙུང་)音译为“Lu-zung”,较好地保留了藏医文化内涵。

2 讨论 通过对 1835—2022 年 11 个《四部医典》英译本的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其一,产生时间。《四部医典》首个英译文本产生于 1835 年,但经百年沉寂后的 1973 年才出现第一个节译本。在 1973—2022 年里,出版的各类英译本多达 10 个,将《四部医典》英译推向高潮。

其二,出版特征。译本的呈现方式较为多元化,早期译文多以论文形式刊于期刊杂志上,或作为章节内容收入于藏学著作中。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开始出现较为系统的单行本,译文内容趋于完善和细化。

其三,翻译文本。已面世的《四部医典》译本均为节译本,尚无全译本出现。翻译文本大多集中在第一部《根本部》和第二部《论说部》。第三部《秘诀部》仅有个别章节译文,第四部《后续部》完整英译本只有一个。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部分译者以个人的兴趣爱好或创作理念优先,有选择性地进行翻译;二则是由于《四部医典》卷帙浩繁,且第三部《秘诀部》的内容尤为艰深晦涩,翻译难度极高,单纯凭靠译者的个人力量几乎不可能完成,这也是至今未出现英文全译本最主要的原因。

其四,译者身份背景。从国别和种族来看,以欧美人士为主,我国藏族同胞和印度学者为辅。从身份和经历来看,以藏学家和医学家为主,个别语言学家参与其中。他们大多具备良好的藏语基础,对藏医学理论也有一定了解。

其五,译者翻译目的。翻译目的不尽相同,或出于个人研究兴趣,如乔玛;或追求翻译学术价值,如埃默瑞克;或为探讨藏医学与阿育吠陀医学的关联,如达什;或以翻译出版为主旨,如印度“门孜康”;或为深入研

究《四部医典》以推动藏医学发展,如央嘎。

其六,名词翻译方法。就翻译方法而言,有音译、意译和直译等多种方法,有的译者结合运用增译技巧,如埃默瑞克、央嘎。译者对藏医学名词术语的翻译和解读,影响着读者对《四部医典》文本信息的接收效果以及译本接受程度。但藏医学名词内涵丰富,这些译法是否准确传达藏医药文化,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3 结语 从 19 世纪早期(1835 年)乔玛用英文正式将《四部医典》译介到向西方,到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不同类型英译本的陆续出现,《四部医典》英译历程已逾百年光阴。译本的产生并非偶然,往往是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历史条件为《四部医典》译本的诞生提供了特定的土壤,使之呈现与时期相应的共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则影响着译本的翻译特征、效果和影响力等多个方面,给予译本以自身独特的个性。不同译本共性与个性的交织,勾勒出了《四部医典》英译历史基本轮廓,共同推动着译史向前演进,使藏医学典籍《四部医典》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但许多译者在翻译和创作时,往往受个人身份、经历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文本中常夹杂着复杂的主观因素和政治倾向。正如蔡景峰所言:“我国几个主要少数民族所处的边疆地区,如西藏、新疆、内蒙古、云南等省区,这里历史上从来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觊觎的焦点。个别为他们服务的御用文人妄图利用医学史研究为他们效劳,对此我们不能不有所警惕”^[4]。因此,《四部医典》广至所有少数民族医学典籍的翻译研究,绝不仅仅是一门简单的学术研究,更是还原历史真相,积极正面地向世界宣传中华民族文化的必行之举。

迄今为止,无论是在《四部医典》英译实践还是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界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对于我国医学典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民族文化对外宣传是极为不利的。但可喜的是,随着近年来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医药迎来了绝好发展环境。此外,我国汉族医学典籍的优秀代表《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在对外翻译与传播上取得的成功,也为《四部医典》英译提供了可以借鉴和复刻的经验。值此机遇,应当乘浪而上,加快《四部医典》翻译传播研究的步伐和领军人才的培养。相信随着国内外《四部医典》译介研究深入,以及我国藏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世界必然更加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利益冲突:无。

参 考 文 献

-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EB/OL]. (2016-12-25) [2023-02-22]. <http://www.npc.gov.cn/>

- www.npc.gov.cn/npc/c12435/201612/b0deb577ba9d46268dcc8d38ae40ae0c.shtml.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的通知[EB/OL]. (2016-02-26) [2023-02-22].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26/content_5046678.htm.
 - [3] 包哈申, 斯琴其木格. 《四部医典》蒙古译文版的考证研究[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08, 10(1): 155–157.
 - [4] 蔡景峰. 论民族医学史的研究[J]. 民族研究, 1985, (5): 37–43.
 - [5] 蔡景峰主编. 中国藏医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6: 244–258.
 - [6] 央视网. 我国又有两项文献档案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EB/OL]. (2023-05-25) [2023-05-29]. <https://news.cctv.com/2023/05/25/ARTIHkjiBbsLXXWrf4thLbjm230525.shtml>.
 - [7] 方梦之主编. 中国译学大辞典[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91.
 - [8] 查明建, 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 2003, 24(1): 22.
 - [9] 房建昌. 乔玛的生平及其在藏学研究上的贡献[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4, (2): 57, 61–62.
 - [10] Csoma de Körös A. Analysis of a Tibetan medical work[J]. J Asiat Soc Bengal, 1835, (37): 1–20.
 - [11] Emmerick RE. A chapter from the Rgyud-bzi[J]. Asia Major, 1975, 19: 142.
 - [12] Liyanaratne J. European contribution to research on ayurveda - work of J. Filliozat, G. J. Meulenbeld, R. E. Emmerick[J]. Anc Sci Life, 1998, 18(2): 95–105.
 - [13] Steiner RP. Tibetan medicine. Part I: introduction to Tibetan medicine and the rGyud-bzi (fourth tantra) [J]. Am J Chin Med, 1987, 15(1–2): 83–88.
 - [14] Steiner RP. Tibetan medicine: Part II: pulse diagnosis in Tibetan medicine: translated from the first chapter for the fourth tantra (rGyud-bzi) [J]. Am J Chin Med, 1987, 15(3–4): 165–170.
 - [15] Steiner RP. Tibetan medicine. Part III: pulse diagnosis in Tibetan medicine. [J]. Am J Chin Med, 1988, 16(3–4): 173–178.
 - [16] Steiner RP. Tibetan medicine Part IV: pulse diagnosis in Tibetan medicine[J]. Am J Chin Med, 1989, 17(1–2): 79–84.
 - [17] Veith I. Review of Tibetan medicine illustrated in original texts[J]. J Hist Med All Sci, 1974, 29(2): 250.
 - [18] 蔡景峰. 藏医学和藏医学史——评甲白衮桑的《西藏医学》[J]. 西藏研究, 1982, (3): 53–62.
 - [19] Rechung Rinpoche Jampal Kunzang. Tibetan medicine: illustrated in original texts[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VII, 43.
 - [20] 宇妥·云丹贡布著. 四部医典(藏文)[M]. 西宁: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09: 44.
 - [21] Finckh E. Foundations of Tibetan medicine[M]. 2nd ed. Dorset: Element Books Ltd, 1988: 1–126.
 - [22] 洪武婵, 蔡景峰. 国外研究西藏医学概况评述[J]. 西藏研究, 1990, (1): 114.
 - [23] 武素功. 评 Elisabeth Finckh 的《藏医基础》[J]. 云南植物研究, 1985, 7(3): 300.
 - [24] Finckh E. Studies in Tibetan medicine[M]. New York: Snow Lion Publications, 1988: 21.
 - [25] Tsarong T. J. Fundamentals of Tibetan medicine[M]. 6th ed. Dharamsala: Men-Tsee-Khang, 2017: 1–125.
 - [26] Clifford T. Tibetan buddhist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the diamond healing[M]. Maine: Samuel Weiser Inc, 1992: XIII.
 - [27] Merriam-Webster. God definition & meaning[EB/OL]. (2023-02-22) [2023-02-22].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god>.
 - [28] 西藏藏医药大学. 央嘎[EB/OL]. (2021-11-04) [2023-05-30]. <http://www.ttmcc.edu.cn/info/1018/10288.htm>.
 - [29] Yang Ga. The sources for the writing of the “Rgyud bzhi”, Tibetan medical classic[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2010: 379, IV.
 - [30] Dash VB. Encyclopaedia of Tibetan medicine Vol. 1. [M].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4: XV–XVI.
 - [31] Dash VB. Encyclopaedia of Tibetan medicine Vol. 4. [M].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5: Flap.
 - [32] 蔡景峰, 洪武婵著. 《四部医典》考源[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1999: 188.
 - [33] Clark B. The quintessence tantras of Tibetan medicine[M]. New York: Snow Lion Publications, 1995: 11, 20.
 - [34] Men-Tsee-Khang. The basic tantra and the explanatory tantra from the secret quintessential instructions on the eight branches of the ambrosia essence tantra[M]. Dharamsala: Men-Tsee-Khang Publications, 2008: 1–375.
 - [35] Men-Tsee-Khang. The subsequent tantra from the secret quintessential instructions on the eight branches of the ambrosia essence tantra[M]. Dharamsala: Men-Tsee-Khang Publications, 2011: 1–349.
 - [36] Men-Tsee-Khang. The oral instruction tantra from the secret quintessential instructions on the eight branches of the ambrosia essence tantra[M]. Dharamsala: Men-Tsee-Khang Publications, 2017: 1–451.

(收稿: 2023-06-14 在线: 2023-10-08)

责任编辑: 赵芳芳